

■本报记者 黄明
本报通讯员 黄宇

春节前，吉林省长春市榆树先锋乡农民杨宝玉因患重症肺炎、肺脓肿，到吉大二院呼吸科住院治疗。住了12天院，医药费1万多元。出院结账时，“新农合”报销近一半。病治好了，还省了钱，这让杨宝玉非常高兴。他乐呵呵地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我家五口人，全年靠种玉米收入1万多元。如果没有‘新农合’，辛苦一年赚的钱就都得花光了。这省下的5000多元，还可以置办点年货，留着买种子、化肥。”

在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给农民带来了“摸得着”、“看得见”的实惠，被称为农民身体健康的“保护神”。

连日来，记者在吉林省农村地区采访时了解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使吉林部分地区农民因病致贫、返贫现象初步得到缓解。记者从刚刚召开的吉林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会议上获悉，截至1月25日，吉林省66个统筹县(市区)共有1252.01万农民参保，参保率达到在乡农业人口的96.55%。人均筹资标准为100元，其中农民个人缴纳由过去的10元提高到20元。全省共筹资基金12.6亿元，支出“新农合”基金11.73亿元，基金使用率达93.15%。全年共有691.68万人次受益。

家里再困难也要参加“新农合”
“新农合”使农民有了病能及时到医院就

医改进行时·吉林“新农合”调查

农民敢进医院了

医生：“实施‘新农合’前，我们最头疼的是农民拖欠医药费和逃费，现在这种现象少了。”

医,不再小病“挺”,大病“扛”着了。

在长春市南关区医院,记者看到,各科病房都住满了病人。院长赵丽萍说,实行“新农合”以来,该院的接诊率呈快速增长态势。“新农合”不仅使农民受益,医院也增加了收入,医疗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九台市龙嘉堡镇农民患者王树立说,现在乡卫生院住院条件同以前相比有了很大改善,不仅环境干净整洁,而且还有了患者食堂等配套设施。他和乡亲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有病舍不得治”。

长春双阳农民孙晋东用自家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参加“新农合”的迫切性。孙晋东的爷爷去年因患胃癌到医院求治,手术费需要4万元。对他们来说,4万元就是天文数字,倾家荡产也凑不上。无奈之下,他们只好把老人领回家买点汤药喝,几个月后老人遗憾而逝。

孙晋东感慨地说,“新农合”真正为农民带来实惠,家里再困难也要参加“新农合”。

记者了解到,2003年,吉林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工作,是全国第一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省份之一。有6个试点县(市)作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新农合”由政府组织、引导、支持,农民自愿参加,个人、集体和政府多方筹资,农民以户为单位,每人每年缴纳10元参合金。2007年,全面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建立起基本覆盖全省农村居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吉林省参保人数比例逐年上升,参合农民1251.5万人,占实际在乡农业人口的95.49%。

长春市作为全省首批试点单位,2009年在市以下所有医院实施了即时报销制度,并将370个标准化村级卫生所纳入定点管理。同时还在全省率先开展了归口导诊试点工作,

充分发挥市级定点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吸引患者就诊,增加业务收入,降低农民自付比例和基金支出额。

在参合基金的前提下,长春市还对补偿政策进行了调整,将门诊账户全部调整为门诊统筹;低段报销比例由20%提高到30%;报销封顶线由2万元提高到3万元等。同时,“新农合”积极配合甲型H1N1流感的防控工作,对传染病患者取消转诊手续,对达菲药品的药费予以全额补偿。

各种有效措施大大减轻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医大二院外科教授肖医生对记者说,实施“新农合”前,医生最头疼的是农民拖欠医药费和逃费,现在这种现象少了。

多举措提高农民自愿参合率
面对“新农合”这一新生事物,记者在采

访中发现,一些青年人并不愿意参加。九台市苇子沟镇头道村党支部书记张德龙说,一些农民不愿意参保,有的去年交了钱,今年就要求退出,特别是年轻人,身体好,觉得参加新农保不合算。

影响农民参合积极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医院药品价格偏高是原因之一。如青霉素,在药店买一支才几元钱,在医院打就得十几元。农民们算过一笔账,如果腿骨折了,在个人诊所花800元,在二甲医院,就要花上三四千元,即使能报1500元左右,也觉得不合算。另外,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普遍存在医疗设备陈旧老化、专业技术人员缺乏等问题。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新农合”让固守于本土的农民感到了“热”,而外出打工的农民却显得有点“冷”。据了解,吉林省有100多万农

民工外出务工,游离于“新农合”之外。如何让这些农民工受益于“新农合”是不容忽视的。记者从1月28日召开的吉林省卫生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全省将加大宣传力度,增强农民的自我参与意识,提高农民的自愿参合率,降低基金征收难度。

确保在乡常住农业人口参合率达90%以上,在校农业户口的乡镇中小學生必须按照以家庭为单位参加“新农合”,利用农村医疗救助基金,确保五保户参合率达到100%。

努力提高筹资水平,完善筹资机制。2010年筹资标准将达到每人每年150元,其中,中央财政每人每年补助60元,省、市、县三级财政每人每年补助60元,参合农民个人缴费由每人每年20元提高到30元。

在全省范围内建立统一的“门诊统筹+住院统筹”的“新农合”补偿模式,“新农合”的平均住院报销补偿比要达到50%以上,进一步完善大病二次补偿机制,努力提高“新农合”基金的利用率,当年统筹基金结余控制在15%以内。

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提高服务水平。加强定点医疗机构监督管理,控制医药费用不合理增长,完善优化就诊转诊程序和即时结算报销的服务方式,方便参合农民在全省范围内各级定点医疗机构就医。

通过这些举措,巩固、完善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使农民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捍卫国家发展权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谈全球未来碳排放权分配

■新华社记者 吴晶晶

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已尘埃落定,但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尤其是长期排放权分配问题,依然是各界关注的焦点。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院士日前表示,研究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应当依据科学事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权分配的方**案**必须要考虑各国历史排放、人均排放和发展阶段的差异,才能做到公平公正。

“排放权即发展权”

在一定时段内,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控制在某个适当的水平之内,已成为全球政治共识。

“要在操作层面上完成对二氧化碳浓度的控制,就必须有一个为全球大部分国家所接受的责任体系,而其中的焦点就是各国今后的排放权分配。”丁仲礼说。

他领导的课题组通过研究发现,所有发达国家都出现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的高峰

期。美国在1973年、英国在1971年、德国和法国在1979年分别达到人均排放高峰,其后略有下降或基本保持不变,并且这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经历过碳排放的高速增长长期,美国在1901年至1910年的人均二氧化碳年排放增长率平均为5.04%,德国在1947年至1957年为9.89%,日本在1960年至1970年高达11.98%。

“可见,任何国家从不发达进入发达这一发展过程中,无一例外地出现了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高峰期的现象。”丁仲礼说,“因此,要发展就难免排放,排放问题本质上就是发展问题,排放权即发展权。”

他指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只有通过降低能源使用总量、调整能源结构、控制人口增长等方式才能实现,因此它本质上是经济社会如何发展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所有国家在其发展经济、提高国民福利过程中,都不能避免能源驱动这个模式,也避免不了碳排放的增加。英国和英国在1900年的人均碳排放就分别达

到2.4吨和3.2吨碳。可以说,目前世界上的低碳经济国家还是那些以自然经济形式存在的最不发达国家。在人类历史上,低碳发展的国家还没有出现过。”丁仲礼说,“即使今后低碳技术获得长足进步,发展中国家在建设基础设施、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

他认为,无论是考虑到历史排放、当前排放,还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不得不产生的排放,在长期排放权分配上,无疑应当向发展中国家倾斜。

减排话语下存在“陷阱”

关于二氧化碳减排,目前国际上有多种方案,绝大多数是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学者提出的。那么,这些减排方案是否科学公正?

丁仲礼课题组对IPCC(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方案、G8国家方案等7个主要方案进行了评估分析。“我们发现这些方案不但没有考虑历史上1900年到2005年期间发达国家的人均累计排放量已是发展

中国家7.54倍的事实,而且还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倍到6.7倍的人均未来排放权。”他说。

“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从工业革命前的270ppmv(百万分之一体积)左右提高到2005年的380ppmv,约有60%来自2005年前人口不到全球15%的27个发达国家。而这些减排方案巧妙地回避了各国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丁仲礼说,“同时,这些方案虽然提出了时间尺度上的排放比例,但没有一个方案考虑人均累计排放量,从而规避了人人平等的公平性。”

他进一步分析说:“这些减排方案从表面上看,发达国家减排量更多;殊不知,在减排话语下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陷阱。”丁仲礼指出,这个陷阱由6步“逻辑推理”构成:第一步,论证全球温度对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的高敏感性;第二步,强调升温可能对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影响;第三步,作出价值判断,即要**在本世纪内**将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增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第四步,计算出

不超过2摄氏度增温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为450ppmv;第五步,发达国家率先提出明确的减排目标;第六步,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具体的减排任务。

“这其中最为关键的一点在于,450ppmv的目标浓度确定后,2006年至2050年期间,人类通过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产生的排放量就随之确定。在这个总量中,发达国家确定‘率先减排’比例后,余下的即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量,且所剩不多。”丁仲礼说。

根据他的计算,如果接受发达国家提出的25%的中期减排目标,中国到2019年即用完排放权。即使这个目标提高到40%,也仅仅将用完排放权的时间推到2021年而已。

“这样的方案将大大剥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益,违背了国际关系中的公平正义原则,也违背了气候变化协议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如果这些方案得到实施的话,将成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他说。

“人均累计排放”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丁仲礼认为,用某个时间点开始的人均累计排放来分配今后的排放权,最能体现公平正义原则。

“从一个国家当前工业基础、城市化水平、人均GDP和国民福利等方面同人均累计排放的高度相关性来论证,这个指标是合理的。”他说。

他指出,从1900年到2005年这一段时期,中国的人均累计排放大约是世界平均数的三分之一,是发达国家的十分之一,是美国的二十分之一。同样,我们今天的排放也刚刚达到或者略超全世界人均排放的平均值,这也只有美国人均排放的四分之一。“这必须作为未来排放权分配中充分考**虑**的因素。”

我国目前处于一个高速发展时期,能源需求旺盛,减排难度不小。“考虑到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和应用低碳技术,实施节能减排的各种努力,我们评估认为,即使在450ppmv至470ppmv浓度控制目标下,中国也有足够的逻辑和道义的支持,要求在2006年至2050年间获得1100亿吨至1300亿吨碳的排放权。”丁仲礼说。

他特别说明,通过计算,发现在450ppmv的控制目标下,现在大部分发达国家已经形成排放赤字,“但我们并非主张这些国家今后不能再有任何排放,而是主张这些国家应该用资金和技术来‘交换’今后的排放权。”

此外,丁仲礼认为,对450ppmv目标不应设定得太刚性。因为450ppmv目标是IPCC在气温对CO2浓度高度敏感的认识下做出的,并且主要来自数值模拟,并非来自对过去百年纪录的严格评估。

“在未来关于气候变化的谈判中,中国应担负起大国的责任,坚持公平正义原则,以‘排放配额’为议题展开谈判,变被动为主动,捍卫国家发展权。”他说。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





集合多方优势,帮助中小企业轻松拥有宝藏,制胜未来! 中国移动携手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民生银行及用友集团、浪潮集团,为中小企业量身定制,共同推出**“中小企业信息化服务包”**,助力百万企业腾飞、蓬勃发展!

- 3类产品:“动力100”信息化系列产品、银行金融类系列产品、软件类系列产品
- 4大收益:节省成本、提高效率、拓展商机、获取资金
- 5项尊崇服务:预约上门、优惠体验、专项资金、绿色通道、成长型企业企业家俱乐部

动力100,信息就是力量!

i-POWER
动力100
信息就是力量

移动改变生活
客服热线:10086 www.chinamobile.com